

江湖

以史诗笔法展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
变迁，揭示知识分子心路历程。

刘继明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江湖

刘继明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湖/刘继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354-4099-0

I. 江…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0960 号

选题策划:刘学明

责任编辑:刘碧芳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30 毫米 1/16 印张:31.25 插页:1

版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72 千字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

| 第一章 |

父亲沈福天和舅舅甄垠年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也许是从他们生下来那天起就注定了的，就像一棵树那样，一旦落地生根，谁也没法改变，包括他们自己。只可惜，父亲和舅舅始终不明白，仿佛两个演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舞台上，起劲地扮演着他们也许自己都不大喜欢的角色，争执了一辈子，直到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撒手西去，也没分出孰胜孰负来。

很长一段时间，沈如月都在为参透这两个谜一般的人物而绞尽脑汁，总是一无所获。如果这是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她也犯不着去操这份闲心，可偏偏他们都是自己的亲人，用一句俗话说，是撑不开的船头，是命定了今生今世要和她纠缠不清的人。更何况，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左右和影响了自己的大半个人生呢！

意识到这一点，沈如月不知应该感到庆幸还是不幸。

这也许正是她一直都想读懂沈福天和甄垠年的真正原因。可从小跟舅舅形影不离，同父亲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甄可昕，自始至终也没读懂这两个人，何况她一个晚辈？

每念至此，沈如月便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受挫感。但她性格里的那份固执，使她不甘心放弃这种努力。这同样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别人无法理解，她自己也无法理解。有时候，她觉得自己都有点着魔了。就像邱少白曾经连嘲弄带规劝地对她说过的那句话：“他们那一代人是清醒和糊涂、骄傲和自卑的混合体，我们呢，糊涂倒是不糊涂了，可半点儿也骄傲不起来。如果他们是傻子和疯子，我们就是残疾。我们比他们聪明的是，年轻时疯过一场醒过来了，他们却到老也不愿意醒过来。和两个又疯又傻的老头较真，犯得着么？”

那是在从西雅图到纽约的班机上。那时沈如月和邱少白还没有分手，在许多人眼里，还算得上一对情投意合的夫妻。但对于邱少白将父亲和舅舅这样刻薄地比做“傻子”和“疯子”，她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苏格拉底和哥

白尼也曾经被人当做疯子呢，你知道他们是真疯还是假疯？”她不软不硬地回应了一句，算是给了脸上挂着那种仿佛“一不小心说出了真理”的得意表情的邱少白一点颜色，以免他又说出什么更难听的话来。同在国内时相比，邱少白不管写文章还是说话，都刻薄了许多，还常常为此自鸣得意，像国内的一些愤青那样，活脱脱一副玩世不恭的嘴脸。

然而，沈如月对父亲和舅舅的探究兴趣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增强了。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冒出一个念头：想写一本关于他们俩的书，不是那篇曾经给她带来不小名声的报告文学，而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

这个念头在心里一经产生，沈如月就不会轻易放弃，仿佛一颗种子那样，在心底生根发芽，直到顽强地生长起来。这种固执并带点儿虚妄的性格是否也有点像舅舅甄垠年？沈如月说不上来。连母亲甄可昕大概也说不清楚。甄可昕对自己一对儿女的性格从来没有表示满意过，她有一次对如月这么叹息道：“你们兄妹俩要是有点地方像我就好了，哪怕像你们的外公呢！”

那是哥哥沈秋池自杀后不久，母亲终于从悲伤中挺过来，头一次提起哥哥，竟是用这样的语气。

这让沈如月惶惑不已，仿佛真的为自己的性格而愧对母亲。

母亲说这话时，父亲不在场，舅舅也不在场，外公更不在场，那时外公甄超然已经去世好些年了。

父亲，舅舅，她和哥哥，都同外公甄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母亲的话让沈如月多年后明白的又一个道理。

二

沈如月第一次到武汉时，对这座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内陆城市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她不是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而是早就来过无数次了。从它的两江合流与三镇鼎立，横穿大半个中国的京广铁路所形成的宏伟气势，到狭窄拥挤的马路、江面上装满各种货物排成长队的驳船、江边密密麻麻的船舶和歪歪倒倒的木板房，以及像黄蜂那样四处乱穿的麻木、街头随处可见的垃圾和油烟滚滚的小吃摊子。各种喧嚣的声浪和灰尘味混杂在一起，仿佛要把整个人都淹没了。包括当地人开口就骂“婊子养”之类的粗话，还有那又辣又涩、味道怪得有点不可思议的热干面，她也觉得以前好像在哪儿吃过似的，觉得格外亲切。以至到了美国以后，当她第一次去芝加哥，听到有人说武汉就是中国的芝加哥时，会心地一笑，连连表示赞同。好像武汉是她的

故乡，或者至少是她的第二故乡。

这都是因为当年父亲沈福天和母亲甄可昕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几年，在沈如月心里产生的一种错觉。

哥哥沈秋池就是在武汉出生的。他在这儿长到两岁才离开，其时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武汉话，有时他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妹妹如月跟胡同里的小子在一起玩，发生了争执，还会用武汉话脱口骂出一句“个板妈的”，对方一愣，听不懂他骂的是什么。趁人家愣神的工夫，哥哥便像占了大便宜一样，拉着她得意洋洋地溜走了。而且哥哥特别喜欢吃热干面。后来到了北京，好几年都对热干面念念不忘，吃不惯北京胡同里的油条和面饼。每次早上起床就嚷嚷着要热干面吃，弄得母亲甄可昕毫无办法，只好用炸酱面来搪塞他，但哥哥只尝了一口，就扔掉筷子，一屁股坐到地上，把一碗香喷喷的炸酱面撒得满地都是。很少发脾气的妈妈这次真生气了，厉声喝道：“大头，起来！等你爸爸回来，我让他把你一个人送到武汉去！”大头是哥哥的小名。一个人被送回武汉是什么情形？他被妈妈的威胁吓住了，顿时停止哭闹，并且以后再也不敢嚷着要热干面吃了。

后来，当沈如月在武汉满怀好奇地吃了一碗热干面之后，觉得哥哥当初纯粹是瞎胡闹，这样难吃的东西也值得他念念不忘？

其实，不仅仅是哥哥，父亲沈福天对热干面也是情有独钟，所以才对儿子的任性和胡闹一直很宽容。沈如月始终对父亲和哥哥的这种“热干面情结”感到匪夷所思。她不知道这种吃起来黏黏糊糊的热干面曾经是父亲和哥哥每天早上的主食，他们在武汉的那几年生活，跟热干面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只有妈妈甄可昕的胃口始终没有适应这种刺激的面食，就像她从来没有对武汉表示过任何好感一样。

这使沈如月意识到，爸爸和哥哥心目中的武汉跟妈妈心目中的武汉，一直就存在天壤之别。

沈福天和甄可昕从重庆刚迁到武汉时，住在武昌司门口一套临时租赁的房子里。

这一带离江边不远，沈福天上班比较方便。每天早晨，穿过几条曲里拐弯的巷子，就到了汉阳门，搭乘过江渡轮，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江对面，上岸后再步行十多分钟，就是洞庭街。当时，“长总”的办公地点就在洞庭街12号。与武汉的标志性建筑江汉关隔街相望。城防司令部就在江汉关斜对面的沿江路上。所以，沈福天每天上班都能见到城防司令部门口进进出出的军车和士兵，有时候碰上某个军界要人，马路上戒严，他还得被耽搁一些时

间，延误了上班。

好在那时在“长总”，沈福天的工作颇为轻松消停，基本上没有什么紧迫的任务。国军和共军在西北、华北打了好几场大仗，不久前，胡宗南的军队就占领了中共首脑机关延安。大概受此喜讯鼓舞，刚刚就任国民政府总统的蒋介石委员长公开宣称三个月内消灭解放军。可时隔不到半年，国军在华东战场便遭到了重创，国军第一个美式机械化部队、号称王牌主力的七十四师，在沂蒙山区孟良崮战役中被共军全歼，蒋委员长的爱将、中将师长张灵甫也当场毙命。这一系列战况从报章上传来，搞得人心浮动、七上八下的，谁还有心思筹划建设？再加上资源委员会已经冻结了所有需要财政投入的建设计划，整个“长总”都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休眠状态。但身为规划处的工程师，沈福天也不想领着薪水混日子，没有新的工程规划，旧的工程规划总还是可以温习一下的吧，所以那段时间，沈福天每天都在资料室里翻阅那些已经存档的三峡工程勘测资料，包括切瑞尔的那份《扬子江水电开发计划》，他也重新找了出来，那副认真的劲头，仿佛工程很快就要上马了似的。

回家后，沈福天一边坐在煤炉子旁给可昕煨筒子骨汤，一边还抱着那些资料看个不停，不时用铅笔在上面做个记号，或者写几行字。甄可听见此情景，很是不解，挺着大肚子在他身边走来走去，想有意分散他的注意力，但沈福天始终无动于衷。可昕忍不住说，国军正跟共军打得不可开交，谁赢谁负还不清楚呢，说不定哪天就打到家门口来了，咱们又得搬家，你还捧着那些废纸当宝贝有什么用？沈福天嘿嘿一笑，说仗总不能永远打下去，不管谁胜谁负，国家将来还是要搞建设的嘛。

甄可听见丈夫那种痴迷的神情，有些无可奈何，却又找不出理由来反对，只好由着他去了。反正现在沈福天每天下了班之后都在家里，自从结婚以后，他们还是第一次这样朝夕相处呢。甄可昕想到自己不用再像以前在重庆那样独守空房，担惊受怕了，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在这种情下降生了。

那天，沈福天把甄可昕送到了辅仁医院。这是一家由基督教武昌堂主办的教会医院，离住地很近。孩子出生时还算顺利，只是临盆时，由于孩子的头颅过大，而可昕的盆骨又偏小，发生了一点小波折，但好在接生医生经验丰富，很快将孩子顺利地导出了产道。当孩子落地时发出一声响亮的啼哭，护士从产房里出来，告诉守在门外的沈福天说：“感谢主，赐给了你一个儿子！”他高兴得差点儿跳了起来，如果不是护士阻拦，他就直接闯进产房里去了。

按照教会医院的规矩，教堂要派牧师给每个新生儿做祷告；如果新生儿

的父母是基督徒，孩子满月后还要受洗礼。给孩子做祷告的是一位年长的奥地利牧师。他来到甄可听的产床前，神情庄重地念了一大串祷告词，末了，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挂到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胸前，面露慈祥之色，俄顷，转脸对沈福天和甄可听说：“感谢主的恩典，通过你们将这个孩子带到人世，你们会爱他，一如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主是爱所有人的。你们有福了。阿门！”

那一刻，沈福天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母亲田桂芝。母亲是信奉基督的。她的孙子是不是也该皈依基督呢？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孩子突然爆发的啼哭声淹没了。

由于孩子的头比一般婴儿都要大，沈福天就给他取名叫“大头”。甄可听不喜欢这个名字，说是像武汉小巷子里出生的那些小伢儿，市井味儿太重，也太俗气了。两人还为此争执了一会儿。可听说，大巴山不是你老家么？李商隐有一句诗“巴山夜雨涨秋池”，还不如叫“秋池”呢！沈福天笑道，你的古诗算是没白读，现在派上用场了，不过，听倒是好听，可叫起来不顺口，要不先叫“大头”，等他上学时再叫“秋池”吧。

这倒是两全其美。甄可听同意了。

三

沈福天的父亲沈厚德是万县地区远近闻名的盐商。其实，沈厚德并非万县本地人氏，他原籍湖南华容县，本名曹厚德，七岁时，荆江和洞庭湖涨大水，远近村镇，一夜之间沦为汪洋，曹厚德的父亲拼力将妻儿俩刚托上屋顶，转眼就被一排巨浪冲得无影无踪了。娘带着他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一路乞讨，几经辗转来到万县，被一个老家在湖北宣恩、名叫沈老幺的船工收留，曹厚德从此就跟着沈老幺姓沈，在峡江地区安顿了下来。

十二岁时，沈厚德就跟着继父沈老幺上船当水手。一开始，他还只是在船上打杂，做饭、洗碗、洗船、劈柴，什么都干。船过险段时，还要跟着继父上岸去帮手拉纤。大人们拉纤都要把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只在两跨间缠一条布片儿，背着纤绳，在江边乱石滩和陡峭的栈道上匍匐前行。沈厚德人小，用不着小布片儿，赤条条混在一帮纤夫中间，他脚杆子还没长稳当，总是摇摇晃晃的，不断地摔跤，一趟下来，浑身上下被石头碰得青一块红一块，纤夫们见了，对老实巴交的继父说，沈老幺，你还是给你儿子弄条布片儿裹上嘛，要是划破了卵子和小鸡巴，可就连媳妇都娶不上啦。在众人的一阵哄笑声中，沈老幺不声不响地从头上取下汗津津的头帕，给他系上了。

对于这位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祖父，沈福天长大后曾听父亲沈厚德用感慨的语气说，你爷爷……那真是个好人的哪！沈如月小时候听父亲沈福天提起这位曾祖父时，用的也是跟沈厚德几乎一模一样的口气“我爷爷”，她并不明白父亲说的“我爷爷”究竟是为了救曾祖母和沈厚德命丧洪水的曹姓“爷爷”，还是后来的那个峡江船工沈老么。但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现在并非血缘所赐的这个姓氏之所以沿用至今，纯系沈厚德或许还有那个曾祖母主观选择的结果，类似于文革当中的那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道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出自某种朴素的情感需要，后者则缘于一种狂热的革命冲动。两者都并非不可以理喻。

遗憾的是，始终把沈厚德当做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船工沈老么不久便死于非命了。他的死亡结局跟沈厚德的亲生父亲一样，都是被大水吞噬的。但沈老么并没有像许多峡江水手那样，死于船只触礁沉没的常见灾祸，他死得很奇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儿说不出口。

沈老么是夜里起来在船舷边解手时，掉进江里淹死的。

那一次，他们的船帮从宜昌往重庆运一批洋布。以往需要花半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把货运到，可那趟行船出奇的顺利，连带卸货只用了十一天，不到两个礼拜。船帮老板高兴得脸上笑开了花，不仅许诺给每位水手加一成工钱，船打回到丰都时，还破天荒地让大伙上岸去打秋风。

“打秋风”不只是指吃喝，还包括逛窑子的意思。凡是峡江上的水手，都免不了沾上这点嗜好，在三步一险滩，五步一回旋的峡江上行船，对生死都看透了，还在乎皮囊之外的那点伦理道德？别看水手们平日里都把性命搁在浪尖上打漂漂，活得其实比在岸上讨生活的那些人潇洒得多。所以，那时在峡江上来来往往的码头上，专门为水手们开设的赌馆和窑子，生意比任何行当都兴隆。但沈厚德的继父沈老么却没沾上这嗜好。也许他年轻时候有过，后来戒掉了；也许是因为养子跟在身边，他不好意思，沈厚德不得而知，反正他没去过沈老么去逛窑子。那次也一样。沈厚德的继父沈老么和一帮水手在丰都的码头酒馆吃喝了一下午，然后，这些大都喝得七八成醉的成年男人们便扔下碗筷，连嘴巴也懒得抹一下，迫不及待地逛窑子去了。只有沈厚德和沈老么没有起身。沈老么还端着酒盅在喝，面对着桌上一堆乱七八糟的残汤剩菜，喝得有滋有味，脸色由红变白，再由白变红，不晓得变了几茬了。平素总是沉默寡言的沈老么就好这一口酒，不管在外行船，还是在家里，也不管桌上有菜还是没菜，他都要喝几盅。直到天煞黑，沈老么才推开面前的酒盅，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时，他趑趄了一下，若不是沈厚德在后面扶住他，他差点儿一头栽倒在门口的麻石板上。

沈厚德搀着醉得不轻的继父沈老么直接回到了船上。船队要在丰都泊一夜，第二天才起锚。没等走进船舱，沈老么就打起了呼噜，他几乎是被比他体重轻一倍的沈厚德像搬运货包那样搬到船舱里去的。不久，他也在沈老么震耳欲聋的鼾声和船身有节奏的颠簸中入睡了。醒来时已经快后半夜了。他是被从窑子里回来的水手们惊醒的。睁开眼睛时，他发现身边不见了继父沈老么。“我爹呢？”他迷迷糊糊地问。“格老子，你爹不是跟你一起回来了吗？”旁边的水手拍了下他的屁股，飘过来一股脂粉气和女人身上才有的味道。他激灵一下，爬起身来，走到船舱外转了一圈，也没看见继父的影子。后来，借着艄楼上的风灯，他在船尾的左舷上看见了一堆稀糊糊的大便。他心里猛一阵紧缩，探头往下面望了一下，江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后来他带着哭腔尖叫了一声，几个刚躺下的水手光着赤膊从船舱里跑出来，一看见船舷边的那堆大便，就顿足惊呼：“格老子的，沈老么拉屎掉到江里啦！”

那堆粪便都凉了，还能去哪里找人呢？

事后，水手们都众口一词地替沈老么抱屈：连窑子都舍不得逛，把命搭在了酒盅里，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噻！

沈厚德也有些替沈老么抱屈，他想，继父的确是把自己的命搭进酒盅里了，否则，以他的水性，那么平缓的江水，船又停在码头，即便蹲在船舷边拉屎掉进了江里，怎么会轻而易举地淹死呢？

沈老么的确死得有些窝囊。

一切都是因为那该死的“猫尿”。这该死的“猫尿”让娘第二次做了寡妇，也让他失去了一个值得亲近的后爹。沈厚德觉得，他跟酒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继父沈老么死后，沈厚德才作古正经开始了他的水手生涯。事实证明，他干得不错，一点也不比沈老么差到哪里去，不仅像沈老么那样对水手的活计样样娴熟，还多了一份沈老么没有的精明和灵活。

后来，沈厚德又换了几个船主，用现在的话说，叫“跳槽”，或者叫“没本事的被老板炒鱿鱼，有本事的炒老板的鱿鱼”。跳来跳去，直到自己当上老板。不过，那时他已经不是船帮老板，而是改了行，变成万县一带有名的德顺盐号的老板了。

当沈福天刚刚能够记事时，他已经跟着全家搬出原来那幢简陋的土坯房，住进了石垞镇边上最为气派的一座豪宅。

为了建这座房子，沈厚德特意从淮安和涪陵请来了工匠，花费近千大洋修建起来的。

房屋紧挨石垞镇，坐落在江边地势最高的一个山坡上，四周是茂盛的风尾竹和柑橘林，整个房屋的面积约1000多平米，三进三出，上下两层，中间一个足足有200平方的庭院，四面是高大的烽火墙，墙壁由清一色的青石砖垒成，屋顶和廊檐上刻有龙凤呈祥的石雕，照壁上还画了一幅西门豹治水的壁画，门口专门请石匠雕了两个大狮子，朝江的一面有一条宽大的回廊，站在回廊上凭栏远眺，峡江像一道深壑被置于脚下，来往的客轮商船尽收眼底。从江面望上去，山坡上的房屋巍然矗立，仿佛一座威严的城堡，承接着八面来风，可谓占尽了石垞镇的风水。

那时候，沈厚德的德顺盐号各分店已经开到了上至万县、下至宜昌的许多地方，他这幢别开生面的宅第无意中给他增添了不小的名声，许多盐商竟然纷纷效仿，在石垞镇和峡江边其他地方建起了一座座跟这幢建筑一模一样的房屋，以至后来有人研究峡江民居发展史时，认为沈厚德的宅第体现了徽州民居与川东民居互相交融的风格，开创了峡江民居由单一格局走向淮川交汇的崭新气象。

沈福天在这样一座宅第里长大成人，说来也是一种骄傲。

可惜的是，1980年盛夏时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使石垞镇发生大面积崩塌，沈家老屋转瞬间沉入江底，再也无从寻觅了。随沈家老屋一同坠入江底的，还有沈福天的大哥沈福川和地主余人庆的女儿余小露。

远在北京的沈福天闻讯以后，把自己在书房里整整关了一个下午。当时正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沈如月走进书房，看到父亲呆坐在藤椅上，一脸阴沉，还以为出了什么天大的事。

就是在那一次，沈福天对她讲起了沈家老屋和老家的一些事情。以前，他在子女面前几乎很少提及自己孩提时的经历。

后来沈如月去三峡时，在石垞镇看到了当地政府在江边半山腰上按照原样复制的沈家老屋。那时候，三峡水库刚刚蓄水到135米，沈家老屋已经属于被重点保护的文物了。

站在那幢复制得如同影视拍摄基地的布景，怎么看都像一件赝品的祖屋前面，沈如月给自己照了一张相。当她俯瞰山腰下水势平缓、水位增高将近100米的江面时，忽然意识到，不仅这幢老屋，就是脚下的这条峡江，也已经不再是祖父和父亲曾经天天面对过的那条峡江了。

想到这一点，她有些感伤。

她无法想象，当父亲沈福天和祖母田桂枝惊闻祖父沈厚德和二伯沈福生的盐船在野马滩失事时，母子二人站在老屋门前面朝着峡江悲痛欲绝、抱头痛哭的情景。

沈厚德的大儿子沈福川那时已经上了成都的川军军官预备学校，生意上的事他只能指望二儿子沈福生了。那一年沈福生才满十八岁，是被沈厚德当做沈家盐业继承人的少老板。如果不是急于想让儿子熟悉生意，早点摸清淮扬盐场那些沟沟坎坎，已经名扬峡江的盐商沈厚德也犯不着亲自带着他去淮安运盐吧。

按照沈厚德对这个从小酷爱读书的幺儿子沈福天的安排，是希望他中学毕业后投考上海交通大学，将来像川江船王卢作孚那样从事航运的。由此可见，在峡江上当水手和二副那段短暂的经历，在盐商沈厚德的心里产生了何其深刻的影响。

沈如月后来想，如果不发生这场意外，祖父沈厚德会不会成为与他所景仰的“川江船王”卢作孚比肩的大实业家，而父亲沈福天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一幅景观呢？

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无法预料。

四

这天下班回来，沈福天顺路到菜场买了一对猪蹄髈。自从甄可昕生下大头后，他每周都要煨两只猪蹄髈给可昕吃，据说这不仅滋补身子，还十分催奶。事实上也的确有效，大头已经半岁多了，可昕的奶水始终很充足。母子都养得白白胖胖。沈福天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他对此颇为得意。

沈福天刚进门，就看见一个面容清癯、身穿灰布长衫的年轻男子坐在当屋，一边晃动摇窝，一边在看书。他晃动摇窝的动作很笨拙，显得有几分滑稽。沈福天愣怔了片刻，才认出这个不速之客原来是自己的妻兄兼同学甄垠年。才两年不见，就差点儿认不出来了。看来黄土高原的风沙真容易改变人啊。

甄垠年的脸色有些发黄，整个人也比以前消瘦了不少。头发乱糟糟的，面露倦容，看上去像是病过一场。两个人互相打量着，还没来得及说话，摇窝里的大头就哇哇大哭起来。哭声惊动了正在做饭的甄可昕，闻声从厨房里奔出来，见两个大男人一言不发地站在那儿，觉得有些好笑。她在围腰上抹了一把水淋淋的手，弯腰从摇窝里抱起大头，伸手一摸，黏糊糊的，这才发现大头的屁股上沾满了黄沁沁的巴巴（小孩的大便），对沈福天急呼：“还愣着干什么，快来帮我一把！”

沈福天赶紧放下蹄髈，过来给甄可昕帮忙。两个人顿时乱作一团，一个给孩子换尿片，一个打水给孩子洗屁股，忙得不亦乐乎。甄垠年在旁边看得

目瞪口呆，却帮不上半点忙，他也不知道如何帮忙。这时，甄可昕顺手将洗完屁股的大头塞到了甄垠年怀里，他毫无准备，差点儿没接稳，用双臂紧紧箍着孩子，丝毫不敢动弹，那副仓皇的样子，仿佛抱着一枚炮弹，紧张得不行，大头最多也就十多斤，可甄垠年觉得重若千斤，沉甸甸的直往下坠。直到沈福天把孩子接过去，他才松了口气。

眼前的这幅场景，大概是甄垠年压根儿没有想到的。他感到既陌生又新鲜。妹妹可昕跟以前在重庆时完全变样了，不仅人长得白皙丰腴，头上的辫子也剪成了短发，蓬松地披在脑后；看上去，已经是个十足的小妇人了。沈福天呢，虽然外表没什么变化，可看他围着孩子忙活时那副轻车熟路的样子，显然也已经是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了。屋子很窄小，到处挂着孩子的衣服和尿片，花花绿绿，像万国旗一样。墙旮旯里还堆放着一排蜂窝煤，显得十分拥挤，空气中散发着呛人的尿臊气和煤烟味儿。凡此种种，都让甄垠年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生活气息。

等安顿好孩子，一切忙完之后，甄可昕又回厨房做饭去了，沈福天和甄垠年这才有工夫坐下来。两年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他们各自的经历却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连时局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当初在重庆分手时，国共两党的和谈还存在最后一线希望，可现在，内战的炮火已经燃遍了整个中国。那时候，他们谁会想到下一次见面是在武汉呢？

两个人话题还未打开，脸上已露出了感慨之色。

“记得当年我们在美国时，都那么迫切地盼望回来为国效力，可现在一晃几年过去了，你我仍然一事无成……”沈福天点燃了一支烟，不胜唏嘘地说。来到武汉后的琐碎生活，已经使他不知不觉染上烟瘾了。

甄垠年知道，扬子江水电开发计划已经中止了。他俩曾经还为此发生过争执，现在的结局正应验了自己当初的预料。但甄垠年并未因此感到高兴。沈福天的话正好触到了他心底的隐痛。

这两年里，甄垠年遭受的挫折可能一点也不亚于沈福天。两年前，他刚到陕西时，可谓也是踌躇满志。向他发出聘书的陕西省水利局长也是江大的老校友，境内的渭水和泾水两条流域连年水患成灾，导致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可历届水利部门一直束手无策。此公担任水利局长后，颇想有一番作为，才特意邀请甄垠年入陕。甄垠年当时在重庆，身处反复无常的政治漩涡，感到厌倦不已，也正想找个稍微偏僻的省份，施展一番自己的治水抱负。上任后，他带着一支勘测队，沿渭水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考察。回来后，由他主持制定了一份《渭河流域水利防洪建设规划》，根据他在密西西比河考察得出的经验，计划用三年时间对渭河两岸的水利设施实行综合治

理，疏通河道、修建堤坝和灌溉系统，以期彻底改变渭河平原水涝成灾的局面。然而，这一规划刚完成不久，国共两党的战事就大规模地开始了，整个西北地区刹那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库，国军和共军像拉锯一样在黄土高原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连西安城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次不是水灾，而是炮火将老百姓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在这种情形下，甄垠年的水利建设规划无疑变成了一纸空文。此时，由于水土不服，甄垠年患上了严重的疟疾，被送到潼关附近的一家传染病医院住了近半年之久。待身体痊愈后，他意识到再留在陕西已毫无意义，遂产生了返回内地的念头。他原本想回上海的，就给父亲甄超然去了一封信，恰在这时，由于时局不稳，国内经济凋敝，致使生源缺乏，各个民办大学尚未从抗战的摧残中恢复元气，更加举步维艰，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路。江大也正在跟同济大学和武汉大学商议合并的事宜，江大校长吴园圃即将出任武大副校长，闻知甄垠年的处境，便欣然邀请他到武大工学院任教。这样，甄垠年就离开陕西，径直来到了武汉。

“江大跟武大合并的事我听说了，他们正缺教员，前不久，我们‘长总’的一位高工也被武大聘过去了。”吃饭时，沈福天说，他往甄垠年碗里夹了一筷子菜，顺便夸奖了一番妻子，“你尝尝可昕的手艺，她现在可是越来越能干了。”

“小妹变化的确大，她以前可是连厨房都不进的。”甄垠年吃了口菜，说，“不过像江大这么一所大学，父亲和吴校长惨淡经营这么多年，一下子就没了，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沈福天说：“是呀，我心里也不大好受。国家兴，则教育兴，可现在国内局势这样糟糕，硬撑下去又能怎样？还不得像别的民办大学那样倒掉？好在同济和武大都是实力雄厚的国立大学，合并以后，江大总还可以发展下去么。”

甄垠年说：“可几十年后，还会有多少人知道江大这个校名呢？”

“事已至此，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沈福天见甄垠年有些感伤，便用安慰的口气说，“眼下兵荒马乱的，也只有大学算是比较安定的一块净土了。说实话，像我这样无所事事的，倒很羡慕你进大学教书呢。”

“现在中国还有哪儿称得上是净土吗？早知如此，我当初真该听莫里斯教授的话，留在美国的。”

甄垠年的话音里明显带着赌气的意味。沈福天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了。

正当这时，给孩子喂完奶的甄可昕在餐桌边坐下来，瞟了他们俩一眼，说：“你们又在讨论什么大事，这样严肃的！”

沈福天说：“哪儿啊，我们正在夸奖你做的菜呢。”

甄可昕半信半疑地问甄垠年：“哥，真的？”

“这还能有假？”甄垠年也顺口道，“以后我可要经常上你们这儿来打牙祭喽。”

甄可昕一听，高兴得像小孩似的拍着手说：“好呀，你索性把伙食费交给我，在我们家搭伙得啦！”

一句话，把沈福天和甄垠年逗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五

甄垠年和沈福天都是江河大学的毕业生。

江河大学是由几个颇为知名的实业家创办的，首创者之一就是当时任上海农工商联合会副会长的甄超然。

甄超然是苏北人，出身于豪门世家，祖上是靠做粮棉生意发迹的，乾隆年间，甄超然的曾祖父还当过朝廷的漕运总督。清末民初时，甄家的生意范围早已超出了粮棉生意，而扩大到农工商等领域，影响也由苏杭两地逐渐拓展到沪申以至全国。到了甄超然手中，他就不仅仅满足于办实业，还将一只脚踏进了兴办教育的领域。

江河大学就是甄超然联手沪上实业界的几位巨头，于1920年创办的，由他亲自兼任董事长，校长则是他花重金从南洋聘请回来的名教育家吴园圃。

其实，甄超然一生的建树远远超出了兴办实业和教育。自青年时代起，他就对政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甄超然都是热情的关注者和参与者。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带头向从日本回国的孙中山捐出巨款，可以说为随后不久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经亲自点名，邀请他赴南京担任要职，却被他婉言谢绝了。这充分说明，甄超然的政治热情，完全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而非他自己有任何从政的野心，早年支持国民党也好，后来支持共产党也好，都是如此。

然而，甄超然的政治热情到了1927年，国共合作因蒋介石在上海制造的四·一二惨案而走向分裂后，降到了最低点。有好长一段时间，他不仅不再过问政治，甚至对子女也严加管束，防止他们有任何激进的政治倾向和行为。为此，他和两个儿子的关系一度弄得很紧张。

一次，正在复旦念书的大儿子甄士年暑假回家，甄超然从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便拿过来丢进壁炉烧掉了，还将儿子在家里关了几天，不让他出门。他哪里知道，其时甄士年已经在上海秘密加

入了共产党。没等暑期结束，甄士年就不堪父亲的禁闭，离开家回学校了。没过多久，他就悄悄去了法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甄超然加紧了对次子甄垠年的管教。那时，甄垠年还在上中学，但甄超然已经对次子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安排。

1935年，甄超然将甄垠年送进了他自己创办的江河大学。

其实，甄垠年一心一意想上的是燕京大学。

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受了哥哥甄士年的影响，甄垠年很早就表现出一种不安分的劲头，从小学到中学，虽然门门功课优良，却跟老师搞不好关系，经常挨训，原因就在他受不了学校的那一套清规戒律，总是爱跟老师顶牛。但碍于父亲甄超然的身份，学校始终对他无可奈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无疑助长了他日后形成的那种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性格。甄垠年这种性格，跟哥哥甄士年几乎如出一辙。或者说，他是按照甄士年作为模型，一刀一斫地将自己雕刻成后来那个样子的。实际上，整个中学期间，甄垠年不仅在言谈举止和装扮做派上，都是对哥哥的刻意模仿，甚至连喜欢读什么书和听什么音乐也差不多。那时候，甄士年从复旦放假带回家来的书籍和杂志，他每次都抢着拿去看，有些书往往甄士年还没读完，他却先看完了。

甄士年带回家的大都是一些文学、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国外的居多，如法国卢梭的《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歌德的《浮士德》、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陀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罗亭》，还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以及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菲·邦纳罗蒂的《为平等而密谋》等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不管读不读得懂，他都要囫圇吞枣地翻阅一遍。当然，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最新出版的国内书刊，如《新青年》、《创造》和《小说月报》，尤其对胡适之、陈独秀的政论文以及鲁迅、茅盾、郁达夫和巴金的作品情有独钟。

但在当时，甄垠年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即便在中学毕业前夕，他就通过熟人偷偷在慕名已久的燕京大学报上了名了，可还是让父亲甄超然像押送犯人那样送进了江大。

1935年，甄垠年和沈福天在江河大学成为了同窗。他们都被分配在水利工程系，而且是同一个班级，住同一间寝室。

其实，跟甄垠年一样，沈福天最初想报考的也不是江河大学。